

以物流成本之降促经济效率之升

在宏观经济指标中,全社会物流成本是一个易被忽略却又颇具代表性的数据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降至13.9%,首次跌破14%大关,这一数字较“十三五”时期末下降0.8个百分点,再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。

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,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实质性提升。这一变化,不仅是物流业发展的里程碑,也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信号——这意味着,每创造100元GDP,所支出的物流费用已降至13.9元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0万亿元体量的庞大经济体来说,相当于全年节约了超千亿元物流费用。

政策发力、产业升级和技术驱动的协同效应,是推动我国全社会物流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。特别是物流结构的持续优化和技术的加快创新,共同推动了全社会物流成本下降。

政策引擎牵引目标落地。2024年11月份,中办、国办印发《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》,提出“到2027年,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力争降至13.5%左右”,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制改革、

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下降,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实质性提升。这一变化,不仅是物流业发展的里程碑,也是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信号。

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、健全国家物流枢纽与通道网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。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工作专班,以跨部门协调破除制度壁垒,仅通过货运平台垄断整治,就推动了公铁联运量的大幅增长,带来了干线运输成本的显著降低。

结构优化释放成本红利。近年来,我国通过建设重大物流枢纽整合资源,构建“通道+枢纽+网络”运行体系,不断发掘物流运作中的规模经济、网络经济,实现单位物流活动成本的有效降低。“公转水”“公转铁”战略持续推进,水运周转量占比超50%,推动大宗物资向更经济更绿色的方式转移。推进物流与产业融合发展,支持制造业、商贸等供应链组织结构持续优化,减少冗余物流环节,降低物流活动强度,推动实体经济创造更大价值。

技术创新重塑运营效率。数字化与绿

色化转型成为物流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,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优化管理系统,大幅降低物流运输空驶率,自动化仓储设备让作业效率进一步提升。同时,新能源运输工具的加快使用,有效降低了整体能耗。数据显示,此类技术应用使2025年保管成本占比下降0.2个百分点。

要指出的是,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不是简单降低运输成本,也不是压缩物流企业的合理利润,更不是影响物流从业人员的收入,而是通过调结构、促改革,优化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,加强物流各环节协同衔接,全面提升物流体系运行效率,用尽可能少的物流费用支出,支撑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。

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一项系统工程。面对2027年降至13.5%左右的目标,当前我国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降低仅是一个起点,真正实现物流体系从“粗放扩张”转向

“精细优化”,未来两年仍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。这其中,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所在。一方面,进一步打破区域分割与地方保护,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。另一方面,聚焦铁路货运、公路货运、物流平台等重点领域改革,推进物流数据开放互联共享,以规模化、规范化的物流生态构建,让全社会物流运行的制度成本持续下降。

货通八方、物畅其流,流动起来的中国才活力满满。物流作为实体经济的“经络”,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。只有“经脉”畅通了,国民经济循环才能更高效,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才更充沛。



“乐购新春”让年味更浓

梁 瑜

春节临近,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《2026“乐购新春”春节特别活动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,将于2月15日至23日春节假期,举办“乐购新春”特别活动,打造全域联动、全民乐享的春节消费盛宴。

春节,是万家团圆、娱乐休闲的幸福时刻,也是拉动社会消费、观察经济脉动的重要窗口。当前,各地各平台年货节活动正火热开展。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日益成为年货消费的主力,“年味”已悄然变化,多了几分新意。

曾几何时,年货是瓜果糖茶的味道。如今,鲜花与水果被装入精美礼盒,生肖文创、潮玩摆件等接连走红。从“能用、够用”到“秀年味、买心意”,年货的变化折射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观念升级。在此背景下,政策适时“加码”,精准把握了春节消费脉搏。

《方案》紧扣年俗文化、家庭团圆、购物出行等核心需求,围绕“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”全链条布局,聚焦首发经济、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、智能消费、健康消费、入境消费等领域精准发力。例如,鼓励各地发布美食地图,组织百街千园、千集万店开展“好礼享不停”活动,支持县域地区举办年货大集等。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,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选择。

促进消费的目标,在于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,更在于通过政策利好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强。观察年货消费市场,人们对高质量、高附加值产品需求旺盛,这方面供给仍显不足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,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。春节正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、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良机。梳理《方案》可知,探索供需适配、丰富多元消费场景、激发实体商业活力贯穿始终。例如,在需求侧,有奖发票有助于激发即时消费意愿,扩大消费参与面。在供给侧,以场景创新与跨界融合丰富供给层次,“住宿+景区”“餐饮+观影”等组合产品,能够创造“1+1>2”的消费体验。这些举措贴合春节消费场景,兼具创新性、普惠性与针对性,既降低消费成本,推动消费向发展型、品质型升级,也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。

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。《方案》的印发,体现了国家提振消费的决心。让消费这驾“马车”跑得更快、更稳,还需持续优化消费环境,切实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、体验感。接下来,持续在供给创新上做“加法”、在惠民服务上做“乘法”,将吸引更多一起“寻味中国年”,为全年消费增长开好局、起好步。

(中国经济网供稿)

建章立制护航人工智能产业

数据显示,2025年,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,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.2万亿元。目前,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、有色、电力、通信等重点行业,逐渐深入产品研发、质量检测、客户服务等重点环节。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,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经济形态与社会治理模式。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框架,是保障其行稳致远的关键举措。

从全球视野观察,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多元化思路。欧盟通过的《人工智能法案》确立了基于风险分级的监管模式,建立了禁止类、高风险类、有限风险类和最小风险类的四级监管体系。美国采取创新导向的监管策略,在《人工智能行政命令》中,注重通过标准化建设和行业自律推动创新。而我公司治理路径的特色体现在“发展与安全并重、创新与规范协同”这一理念上,创新探索出数据权益分配与流通利用机制,既保障了数据安全,又畅通了数据要素市场循环,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也要清醒认识到,我国人工智能法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。在立法层面,专门性法律缺位,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合尚不完善。在监管实施中,部门职责不清晰、交叉与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依然存在,算法透明度要求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好平衡。在技术治理层面,数据质量参差不齐、算法偏见难以消除、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仍待破解。此外,在知识产权保护

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,也面临着数据治理、算法歧视、平台垄断等挑战。亟需通过立法明确数据权属、规范算法应用、强化平台责任,构建公平、透明、安全的数字生态。

在立法进程中,构建以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为核心、以技术标准体系为支撑的规范系统。在监管创新方面,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平台,统一执法标准,在自动驾驶等特定领域推行“监管沙盒”机制,设立创新实验区,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。

在数据治理上,突破产权界定难题,可构建包括数据持有权、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在内的综合制度安排。建立覆盖数据收集、使用、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机制,特别是在训练数据质量评估、数据标注规范等方面建立统一标准。

在算法问责上,建立覆盖设计、开发、部署全流程的问责机制,特别是在高风险领域设置强制性评估要求。引入算法影响评估制度,要求开发者在系统部署前进行公平性、透明度、安全性评估,并赋予用户解释请求权和异议权。

此外,强化企业主体责任,推动伦理审查内化为研发流程,鼓励设立算法治理委员会。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更高水平的行业准则和技术规范,建立人工智能伦理认证体系。完善公众参与机制,通过听证会、专家评议、民意调查等方式凝聚社会共识,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公共利益。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,推动建立公平、包容、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。



王 铎

春节临近,一些“抢票神器”声称能通过“专人抢票”“极速抢票”等手段获取火车票,收取10元至几十元不等的“抢票费”。这一功能是否名副其实?近日,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了一起平台虚假“抢票”典型案件,涉案平台所称的“平台抢票”实际上是12306系统官网候补,各种所谓的抢票手段实为误导旅客的消费陷阱,不但不能“提速”抢票,也无法“余票监控”。这类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行为,不仅破坏了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,也损害了旅客利益和乘车体验,对此需强化监管。事实上,现有抢票软件无法突破12306官方平台的候补规则,消费者要提高防范意识,谨防上当受骗。

(时 铎)

从制度入手筑牢创新生态根基

董 静

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大数据分析显示,2025年,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融合,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持续提升、战略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、传统产业转型加快等方面。

2025年,我国科研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.4%,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(专利)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.7%,反映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加大。同时,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,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逐步提高,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39262亿元,稳居世界第二位;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.8%,比上年提高0.11个百分点,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国家平均水平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,量子科技、生命科学、物质科学、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,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量子技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,一批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。

为强化战略科技力量,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科技体制改革及创新激励相关的政策。比如,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为激发创新活力、规范创新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。《科技

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(2021—2023年)》旨在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,加快建立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,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。一些省份出台的政策从研发投入、创新平台、成果转化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,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给予税收优惠,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、研发投入、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。

我国科技创新成就显著,但依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、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、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等情况,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仍面临困难。对此,要从制度环境、创新策源、产业融合层面协同发力,久久为功,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
优化制度环境,筑牢创新生态根基。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,完善原始创新制度体系,增强前沿领域创新能力,确保创新资源得到高效配置。面对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,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规章,健全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,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,构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,制定促

县域富民产业立足于县域,落脚于富民。应以土特产为核心,构建多元产业生态,实现“兴一个产业、富一方百姓”的目标。

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,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,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,健全联农带农机制。这是2026年“三农”工作重点任务之一。当前,县域富民产业不仅承载着农民增收的期待,更担负着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使命。

县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,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。数据显示,我国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约90%,以全国约52%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经济总规模的近40%。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呈现出集群化、融合化、数字化交织的新态势。截至2025年年底,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累计支持各地建设26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、4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、1909个农业产业强镇,引导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等资源要素向产业融合平台集聚。例如,山东寿光通过产业集群建设引导要素集聚、催化产业融合,实现了寿光蔬菜富民产业的整体跃升。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,推动农业从单一种养向全链增值转型,县域富民产业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比如,陕西洛川构建起苹果产业的“四梁八柱”,集研发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于一体,延伸出果汁、果醋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,形成了产业链闭环,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。

县域富民产业立足于县域,落脚于富民。在深度挖掘本地资源禀赋的基础上,应以土特产为核心,构建起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多元产业生态,把增值收益和就业岗位最大限度留在县域、留给农民,让产业增值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源头活水,实现“兴一个产业、富一方百姓”的目标。

进一步而言,我国县域富民产业的特色体现在多个层面。一是由政府主导,通过产业备案与布局指导,有助于实现有序布局与差异化发展。二是基本建成全产业链闭环,注重从研发、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延伸,形成“从田间到餐桌”的完整产业生态。三是农民主体地位得到保障,通过打造富民产业联合体,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链各环节,实现家门口就业、产业链增收。此外,集群化与融合化并重,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,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,富民产业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。

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势头良好,但仍有短板。比如,产业组织小、散、弱,产业价值链短浅,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。对此,需推动县域富民产业从“小散弱”向“大聚强”转变,从“卖原料”向“卖产品”转变,从“弱联结”向“强联结”转变,实现兴产富民。

壮大产业组织,破解小、散、弱困局。立足资源禀赋、区位条件、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,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。建立国家层面县域主导产业备案制度,对县域产业布局进行优化指导。坚持因县施策,强化市场导向,推动县域产业与市场精准定位,引导差异化发展。打造产业联合体,建立“龙头企业+中小微企业+家庭工坊”产业联盟,推动有经济效益的环节向县城聚集,形成县域产业集群。

延伸产业链条,扭转“卖原料”惯性。积极引导资本下乡,与村集体、农户深度融合,共建现代家庭农场与股份合作社,推动产业从单一生产向精深加工、冷链物流、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,构建“生产+加工+销售”一体化模式。推行县级龙头企业对接农业农村部门“数农平台”,补上产业链弱项短板,提升产品附加值。借力农村电商、乡村文旅,铸造“土特产”金字招牌,打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壁垒,助力产业链条从“底层”向“高端”转变。

健全利益联结,弥合“弱联结”断点。强化县级龙头企业带动作用,加大对联农企业在土地、贷款、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。推广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+二次返利”等多元利益联结,通过“订单生产+股份合作+合股经营”三位一体模式,推动企业与农户形成契约型、股权型合作,建立农户与企业利益挂钩机制,确保农民同步分享加工、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收益,持续促进农民增收。发挥县域消费升级的经济带动作用,完善配套政策措施,优化创业环境,丰富消费供给,构建设施完善、双向顺畅的县域流通网络,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新场景。